

主 编 陈金钊
副 主 编 左 峰 吴文新

黄海学术论坛

HUANGHAI XUESHU LUNTAN

第十九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海学术论坛. 第 19 辑 / 陈金钊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12

ISBN 978 - 7 - 5426 - 4051 - 2

I. ①黄… II. ①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4644 号

黄海学术论坛(第十九辑)

主 编 / 陈金钊

责任编辑 / 张大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喻 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00)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号楼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8.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051 - 2/C · 457

定 价 / 4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56475597

《海学术论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陈金钊

副 主 编 左 峰 吴文新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左 峰 刘宝全 陈金钊 吴文新

张红军 张建波 张琳仙 张伟强

罗润东 范广垠 常晓梅

目 录

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

马克思两大发现的休闲逻辑基础

——代为《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休闲：享受和发展》

一书序言	刘晨晔(1)
国民休闲纲要：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战略规划	吴文新(22)
论在继续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李建宁(30)
哲学：提升人生境界的智慧	兰 明(37)
论孙中山的道德信念	杜芳芳 朱康有(43)
根本对立与辩证否定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思考	卢 新(52)
共产主义为什么不是乌托邦	
——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启示	吴 静(60)
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共产主义思想	肖 蓉(68)
论作为马克思理论立足点的“现实的人”	孙莎莎(76)

文化语言与文学研究

“仁”字产生于西周初年考	张德苏(83)
--------------------	-----------

从珍妮隐约的经济地位看其模糊的独立黑人

- 女性形象 张彩波(93)
- 我国德英语对比研究30年:回顾与展望 黎东良 卢健(101)
- 综合性译学词典的附录设置
- 《中国翻译词典》与《译学大词典》附录设置之
- 比较 薄振杰(110)
- 韩国早期叙事诗的特征与文学史的意义 柳正一(121)
- 从对话关系看卞之琳的诗歌抒情策略 宋琦(135)
- 二语习得个体差异因素动机研究 赵薇(142)
- 基于同声传译研究认知模型的自主训练策略 王苏华(150)
- 联绵词古今辨 赵付美(157)
- 汉语惯用语语言特性的调查研究 许慎(164)

法律与政治学研究

- 村民自治异化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创新 陈永刚(174)
- 清末山东州县警政建设 杨发源(186)
- 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运动及其影响 常辉(197)
- 试论整体政府对新公共管理的新突破 徐盼盼(204)
- 高校研究生自杀意念及其影响因素的
- 调查评估 李亮 王诗迪 郑越(211)
- 法律修辞方法的辨法析理艺术 宋保振(219)
- 论香港公司法定秘书制度及其对大陆的借鉴意义 费青来(233)
- 论诚信原则的司法实践与社会诚信 杨学慧 袁芳(241)

经济金融与管理研究

- 适宜知识创造的企业组织及其模糊综合评价 ... 戈黎华 曹宁(247)

我国农村信贷配给及农村金融体系改革	刘 俊(257)
对我国小额附加福利课税问题的探讨	朱方平(269)

书评

“和谐发展”视角下嵇康美学的深度挖掘

——《嵇康美学思想述评》评介	郝书翠(279)
----------------------	----------

横跨学科 内容丰富 别具一格

——《英语诗歌文体学研究》述评	王晓青(283)
-----------------------	----------

审美文化:休闲研究新的理论视界

——张玉勤教授《休闲美学》简评	殷 雪(290)
-----------------------	----------

马克思两大发现的休闲逻辑基础

——代为《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休闲:享受和发展》一书序言

· 刘晨晔*

自恩格斯提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以降,人们通常都是从社会物质生产角度去确立它的单一内在逻辑基础——劳动。但有两人为这种观点注入了异质性因素:拉布里奥拉较早强调经济结构而不是经济范畴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基础地位,列宁较早注意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大众向度和生活时间分析的重要性。这引导我们运用新的文本解读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重新审视马克思的思想,结果发现马克思两大发现的休闲逻辑基础,它与劳动逻辑同时并存,交织缠绕,构成马克思思想的深层逻辑根基。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休闲逻辑基础还处于朦胧状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它潜在于人类历史“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诸因素或诸方面中,到《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已经存在于“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辩证关系的直接隐喻之中。

一、对马克思两大发现的内在逻辑基础的认识及存在问题

恩格斯最早将马克思一生理论创造的最高成就归结为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即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对于这两大发现,人们主要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角度去理

* 作者简介:刘晨晔,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休闲学。

解,换言之,人们主要从社会物质生产方式角度去探讨马克思两大发现的逻辑基础。这一传统始于恩格斯。对于第一个发现,恩格斯的评价是:“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对于第二个发现,恩格斯接着说:“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p. 776)]

与恩格斯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朗茨·梅林曾经发表过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认为人类是一种死板的机械运动的无意识的万物;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观念的力量。”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人类精神发展愈高,那么

将有更美丽的谜走出黑夜,
它所包罗的世界将更为丰富,
它所流入的海洋将更为波涛壮阔,
命运的盲目势力则将更见薄弱。

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指出了精神发展的这个规律,它发现,这个规律的根源就在于使人成为人的东西里,就在生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中。”^[2](p. 39)]在批判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时,梅林指出,一方面,“马克思对于自然力在人类生产中的意义始终给予最深切的重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每一时代的生产方式里都包含着这一时代的劳动自然条件,在这范围以外,自然在人类社会史中就没有什么干系了。”^[2](pp. 68-70)]显然,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归根结底是对人们劳动生活的分析。

普列汉诺夫在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法国历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及黑格尔的历史观的比较研究中,得出基本相似的结论,认为在历史的终极决定要素方面,“他们——直接地或间接地——都乞求于人的天性”,而“马克思的伟大的科学功绩就在于,他完全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近问题,他把人的天性看作是历史运动的永远地改变着的结果,而历史运动的原因在人之外。为了生存,人应该维持自己的机体,从他周围的外间自然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质。这种摄取需要人对这个外间自然的一定的作用。可是‘在作用于外间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普列汉诺夫说的对“外间自然”的“作用”,其内涵基本等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物质生产劳动”,他还认为“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3](P.107)}

意大利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在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历史发展时,也认为:“人类创造了历史,同时他们也创造他们自己的条件,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一种人为的环境,他们逐渐发展自己的技能,并在这种新的环境中积累和改造自己的活动成果。”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时,他认为:“只要这个社会借助资本把人类劳动的全部产品变为商品,以无产阶级为前提或者创造出无产阶级,并且带来不安、混乱和不断革命的动荡局面,这种社会就在一定时期内以十分清晰的、虽然是不同的方式出现。”^{[4](pp.42-43)}

列宁继承了恩格斯开创的这一理论传统,对于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他曾经做过如下评价:“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5](p.586)}对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列宁指出:“马克思继续了他们(指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引者注)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即劳动价值论——引者注)。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工人用一部分工作时间作为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而另

一部分工作时间工人是无报酬地劳动的,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5](pp. 443-444)

可见,尽管这些思想家们的阐述各有侧重,却都不约而同地抓住唯物史观的重要现实生活基础之一——物质生产劳动——展开分析,亦即都特别关注人们劳动生活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历史的与现实的。毫无疑问,这没有脱离马克思思想的初衷。而且,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这些思想家实际上是揭示了马克思两大发现的一个内在逻辑基础——劳动(生活)。但列宁这两段论述的后一个方面均值得注意:第一段论述的后一方面实际上是强调了唯物史观的大众生活向度;第二段论述的后一方面触及了工人劳动生活时间的分配问题,尽管这些认识来源于马克思思想本身,但恰恰是我们以往研究马克思和列宁思想时重视不够的方面。

其实,在列宁之前,拉布里奥拉在阐述自己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他赞同把人类社会历史看成是一个有机系统的整体历史观,指出:“有人说,必须完整地考察历史,考察它的整个总和;历史的核心和外壳构成一个整体”。他认为,从这种说法中显然可以引出三个结论:“首先,在历史决定论的领域内永远不可能一眼就看出原因和结果之间、条件和它所制约的现象之间、先前的现象和后来的现象之间的联系”,要揭示和再现这种联系,“必须跳出意识这个狭小的框框,分析人类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一方面是社会条件造成的,另一方面却消失在人类本性所固有的生物特性(包括遗传特性和返祖性)的黑暗深渊中。”其次,“我们的学说不是要把历史事实的整个复杂的进程归结为经济范畴,而只是要用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语)来归根到底(恩格斯语)解释每一个历史事实。这样的任务要求分析并找出最简单的因素,然后再把彼此相联系的单个因素连接起来,即综合法。”“第三,由此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为了从构成基础的结构过渡到一定的具有各种各样形式的历史过程,必然要求助于概念和知识的综合。”因为一时找不到很合适的术语,他就称这种综合为“社会心理学”,用它来说明“比较质朴和平凡的东西:社会意识的具体的和一定的形式。”因此,他在肯定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的同时,还强调指出:“但是,这些意识形式既然决定于生活条件,也就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历史——这不仅是社会的经济解剖,而且是蒙住和遮盖这种

解剖的种种现象,包括它在幻想中的种种反映的总和。或者换言之,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是依赖于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种种条件而产生的;同时,也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为先导的、由它相伴随和由它所跟随的,而不论这种意识是以迷信或经验为基础,是以直接感受或反射为基础,是充分发展的或不彻底的,是心血来潮的或自我控制的,是幻想的或纯理论的。”^{[4](pp.61-63)}拉布里奥拉的这段论述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列宁上述思想的展开阐述,或称是它的预见性注释,因为它比列宁的论述早发表八年多。这段论述有三点需要人们给以特别的注意:

第一,人们解释历史事实的最佳出发点和根据何在?我们以往的做法通常是,“把历史事实的整个复杂的进程归结为经济范畴”,据此展开这种解释。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社会历史事实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经济范畴仅仅是其中的一类要素,它虽然重要,但决不等于全部,更不能代替一切。所以,拉布里奥拉强调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用构成历史事实基础的经济结构来归根到底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在这里,经济结构和经济范畴显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后者要比前者宽泛许多,表面化得多,是更具体的存在。而真正决定历史事实发生和发展的不是这些具体的东西,而是那些隐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因素,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经济结构,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众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所形塑的产物。

第二,上述事实告诉我们,历史研究必须经历一个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的简化过程,即分析并找出影响历史事实发生和发展的“最简单的因素”,当然也是最重要、最关键、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因素,然后再把彼此相联系的单个因素连接起来,形成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较为完整的解释。那么,如何确定和指认这些“最简单的因素”呢?这无疑是一个关键性技术问题,也是区分哲学流派的重要根据之一。拉布里奥拉给出的选择是抓住“人类的基本需要”,从分析这种需要入手展开研究,对“人类本性所固有的生物特性”给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这与列宁强调大众生活向度的思想如出一辙。

第三,拉布里奥拉还肯定意识形式是构成历史的一部分,认为一个历史事实固然离不开作为其基础的经济结构,同样也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为先导的、由它相伴随和由它所跟随的,而不论这种意识是以迷信或经验为基础,是以直接感受或反射为基础,是充分发展的或不

彻底的,是心血来潮的或自我控制的,是幻想的或纯理论的。这再次显示了大众生活向度的价值指向。

这种思想是列宁和拉布里奥拉的首创,还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固有意蕴?这些年我一直带着这个问题,重读马克思的有关著作,终于有所收获,对马克思两大发现的内在逻辑结构获得了新的理解。

二、异化劳动与异化休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双重逻辑基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开始关注经济问题和劳动批判的重要转折点。尽管马克思写作这个手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表,但它还是真实地反映了马克思理论探索的心路历程。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开始从异化视角思考人类解放问题。以往我们对《手稿》有一种误解,只讲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实际上,马克思的异化观包括两个层次,即一般异化和异化劳动:前一层次的异化是建立在一般社会关系基础上的,是依赖性的异化;后一层次的异化是建立在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是统治性的异化,是一种萌芽状态的阶级关系理论。这在《手稿》的一段论述中清楚地反映出来。马克思指出:“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6](p.130)}我理解,马克思讲的是这样三层意思:其一,是人们生活资料的占有和被占有关系,因而,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是一种物质利益对抗关系;其二,人的行为及其结果自己不能主宰,从而造成对他人或外物的依赖,使人及其活动外化,是一种依赖关系。其三,这后一层面的异化不仅适用于工人阶级,也适用于资本家,他们也在贪婪的逐利与挥霍中为物所困,从而形成对工人阶级的依赖。

对前一层次的异化人们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暂时略而不谈,在此重点考察马克思关于后一层次的异化思想。

人的需要是分析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人的现实需要展开的状况决定人的生活方式。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本家的“考究的需要”，另一种是工人的“粗陋的需要”。这两种需要的现实内容、满足模式及国民经济学根据均是不同的。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6](p.120)} 这是从主观方面的分析。从客观方面来说，“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没有一个宦官不是下贱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木不仁的享受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厚颜无耻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6](pp.120-121)}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从客观方面看，还是从主观方面看，无论从新的需要的制造者、怂恿鼓动者来讲，还是从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享受者来讲，一句话，整个资本家阶级，都在被异化，被自己的需要（与其说是需要不如说是贪欲）及其满足的模式所异化。这种异化的特点就是被物（包括货币）所役，成为物的“奴隶”，它以两种方式展现出来的，一种方式是不择手段“诱取黄金鸟”，贪婪追求物质财富的价值，遮蔽乃至否定人本身的价值，直至扭曲人性；另一种方式是追求“无节制”挥霍、享乐，使商品和服务成为异己的力量，淹没人本身，被物所役，迷失自我。如果说早期资本家表现出的主要是前一副面孔，那么，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资本家们表现出的就主要是后一副面孔。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对此有深入的揭露。他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而“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于是，就出现了

“欧洲将把体力劳动,起初把农业劳动和矿业劳动,然后把比较笨重的工业劳动,推给有色人种去干,自己安然地当食利者”的现象。这也就成为消费社会兴起的早期根源之一。^{[7](pp.412-417)}但两种方式殊途同归,最终都使资本家被异化。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马克思上述异化思想中,还有更深层的意蕴。很明显,“富人考究的需要”及其满足模式本身也是充满异化的,而且与工人通常遭遇的异化不同,它主要发生在非生产性或非直接生产性的社会活动中,不属于异化劳动范畴,而是另一种异化,一种源自非直接生产性活动的异化。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其与异化劳动相对应称之为异化休闲。

当然,工人也不是就与异化休闲绝对无缘。马克思在第一手稿中的一段论述可以作为理解这一点的重要理论进路。他说:“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因此,它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6](p.14)}显然,马克思直接讲的是经济学家在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时,不仅要关注他们的劳动生活,而且要关注他们不劳动时的生活,这实际上是在更深层次隐喻要关注工人的业余生活,亦即休闲生活:他们的劳动生活固然有价值,他们的休闲生活也同样有价值,他们的劳动生活和休闲生活都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应赋予他们同样的权力。因此,在后面的手稿中,他既论述了资本家的休闲享乐生活,还论述了工人大部分被资本家占有、所剩极其有限的休闲生活。

马克思在《手稿》“笔记本Ⅲ”中进一步指出:“——正像工业利用需要的讲究来进行投机一样,工业也利用需要的粗陋,而且是人为地造成需要的粗陋来进行投机。因此,对于这种粗陋来说,自我麻醉,这种对需要的表面满足,这种包容在需要的粗陋野蛮之中的文明,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因此,英国的酒店是私有制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表现。酒店的奢侈表明工业的奢侈和财富对人的真正的关系。因此,酒店理所当然地是人民惟一的、至少得到英国警察宽容的星期日娱乐场所。”^{[6](p.126)}显然,尽管工人更多是遭遇异化劳动,工业有时也利用他们的人为造成的粗陋的需要进行投机,使其陷

入资本家设下的另一种陷阱——纵欲和消费——而被异化,在酒精中偶尔体会一次异化休闲。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论及这种现象,他说:“但是也正像演员在整个戏的演出中是属于舞台一样,现在,工人在15小时之内是属于工厂,其中还不包括上下工走路的时间。于是,休息时间变成了强制闲逛的时间,它把少年男工赶进酒店,把少年女工赶进妓院。”^{[8](p.323)}这不禁使我联想到曾经读过的一首描写工人夜生活的诗:“我的休息之夜是/5杯啤酒,/12支香烟,/还有14个笑话,长长地。”^{[9](p.130)}这无疑给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异化休闲的思想提供了又一个佐证。

拉法格补充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指出了工人还面临另一种形式的异化休闲。他说:“为了执行既是非生产者又是过度消费者的双重社会职能,资产阶级不仅要使过去颇有节制的欲望变得十分强烈,丢掉两个世纪以前从事劳动的习惯,去过花天酒地、荒淫无度的生活,而且还要使一大批人脱离生产性劳动,来为他们服务。”^[10]也就是说,资本家的这种异化休闲创生了另一个社会阶层,这些人虽出身无产阶级,但他们受雇直接为资本家及其家眷提供生活服务,长期脱离生产性劳动,耳濡目染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逐渐为其同化,陷入异化休闲境地。后来,凡勃伦则明确用“代理有闲(vicarious leisure)”和“代理消费(vicarious consumption)”来指称这些人的这种特殊“劳动”^{[11](p.47,53)},并且认为它已经成为资本家炫耀性消费的象征和标志,这种理解使我们认识到这些人的异化休闲隐含更深一层意蕴,即作为资产阶级异化休闲的象征物和标志物而被异化。

在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异化休闲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丹尼尔·贝尔对此有深入透彻的分析,他说:“但是在今天,实际上,生理饥饿已经不再是驱动力,存在着某种新的饥饿。诱人的报酬和对物品的渴望已经取代了棍棒;生活水准已经变成了一个内在的自动驱力。受自发明枪炮以来最杰出的两个发明——广告和分期付款——的激励和煽动,销售活动已经变成了当代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活动。销售反对节俭,重视挥霍;反对禁欲,提倡浪费。”这就“像《财富》提到过的那样,美国公民从早到晚都生活在围攻状态之中。‘他看到、听到、摸到、尝到和闻到的每一事物几乎都是企图向他推销某样东西。……为了突破他的防线,广告商反复攻击他,揶揄他,提醒他、或激怒他,潜移默化地或者用中国式的软磨硬泡的方法消磨他

的意志。在墙上,在天空,到处都充塞着广告,一到晚上便到处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招牌。”贝尔接着评论道:“如果说美国工人已经被‘驯服’了,那么他不是被机器原则驯服的,而是被‘消费社会’驯服的,是被由他的工资、他的劳工妻子的第二笔工资,再加上所有低息贷款所提供的较优裕生活的可能性驯服的。”贝尔注意到,许多调查研究表明,工人当中普遍存在的心态是,“与其生活方式上的成功相比,某人工作上的成功正在变得不甚重要”,“他正在为得到一个‘小巧别致的现代居室’而工作”。这意味着“美国梦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于是,“游玩、娱乐、消遣是当今我们文化的主题,也是‘强行推销’的主题。”消费者在不自觉地由主动选择者变成了被动接受人,而“在人的被动性中,已经埋下了堕落的种子。”^{[12](pp. 279-284)}如果说异化劳动是造就工人阶级意识的社会条件,那么,异化休闲则对工人的阶级意识起到消解作用。

可见,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中潜在这样一种逻辑:现实社会生活经过异化的否定过程,就是异化劳动和异化休闲的双重否定过程,是在劳动和休闲这两个被人为分割的逻辑基点上的否定过程(关于劳动和休闲的同一性及其被人为割裂的历史,请看本文稍后的专门阐述);这种异化不仅关涉工人阶级,而且关涉资本家阶级;因此,只有在劳动和休闲双重逻辑基点上,在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中,同时消除异化现象,才能最终达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五个因素”:

唯物史观三重现实生活实践基础

如果说《巴黎手稿》只代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走向成熟的里程碑,是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在这部光辉巨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发生学角度阐释了早期人类历史的发生和发展,特别追溯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基本要素,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两大发现的休闲思想基础的又一个重要切入点和文本根据。为了便于理解,现将其中的有关原文摘录如下: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 social 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

……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只有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3](pp. 67-81)

从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主要有五个初始要素,我把它称为五个主要的初始生长原点:第一,“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劳动生活;第二,“新的需要”,它是由“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